

主编

李天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哲学（第二辑）

思想自由史

〔英〕伯利(J.B.Bury)著 宋桂煌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主编 李天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 · 哲学（第二辑）

思想自由史

〔英〕伯利 (J.B.Bury.) 著 宋桂煌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想自由史/李天纲主编.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7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 哲学)

ISBN 978-7-5520-1815-8

I . ①思… II . ①李… III . ①自由－思想史－欧洲 IV . ①B0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32165号

思想自由史

主 编：李天纲

编 纂：赵 炬

责任编辑：唐云松

特约编辑：陈宁宁

封面设计：清 风

策 划：赵 炬

执 行：取映文化

加工整理：嘎 拉 江 岩 牵 牛 莉 娜

责任校对：笑 然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sassp@sass.org.cn

排 版：上海三联读者服务合作公司

印 刷：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650×900毫米 1/16开

印 张：14.5

字 数：200千字

版 次：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20-1815-8/B.191

定价：76.00元（精装）

民国西学：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序

李天纲

继唐代翻译印度佛经之后，二十世纪是中国翻译历史上的第二高峰时期。来自欧美的『西学』，以巨大的规模涌入中国，参与改变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域外知识大规模地输入本土，与当地文化交换信息，激发思想，乃至产生新的理论，全球范围也仅仅发生过有数的那么几次。除了唐代中原人用汉语翻译印度思想之外，公元九、十世纪阿拉伯人翻译希腊文化，有一场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之外，还有欧洲十四、十五世纪从阿拉伯、希腊、希伯来等『东方』民族的典籍中翻译古代文献，汇入欧洲文化，史称『文艺复兴』。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大量翻译欧美『西学』，可以和以上的几次翻译运动相比拟，称之为『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并不过分。运动似乎是突如其来，其实早有前奏。梁启超(1873-1929)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自明末徐光启、李之藻等广译算学、天文、水利诸书，为欧籍入中国之始。』利玛窦(Mateo Ricci, 1552-1610)、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发动的明末清初天主教翻译运动，比清末的『西学』早了二百年。梁启超有所不知的是：利、徐、李等人不但翻译了天文、历算等『科学』著作，还翻译了诸如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灵言蠡勺》)、《形而上学》(《名理探》)等神学、哲学著作。梁启超称明末翻译为『西学东渐』之始是对的，但他说其『范围亦限于天(文)、(历)算』，则误导了他的学生们一百年，直到今天。

序 言

从明末到清末的『西学』翻译只是开始，而且断断续续，并不连贯成为一场『运动』。各种原因导致了『西学』的挫折：被明清易代的战火打断；受清初『中国礼仪之争』的影响，欧洲在 1773 年禁止了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以及儒家保守主义思潮在清代的兴起。鸦片战争以后很久，再次翻译『西学』，仍然只在上海和江南地区。从翻译规模来看，以上海为中心的翻译人才、出版机构和发行组织都比明末强大了，影响力却仍然有限。梁启超说：『惟（上海江南）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李善兰、华蘅芳、赵仲涵等任笔受。其人皆学有根底，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李。』梁启超对清末翻译的规模估计还是不足，但说『戊戌变法』之前的『西学』翻译只在上海、香港、澳门等地零散从事，影响范围并不及于内地，则是事实。

对明末和清末的『西学』做了简短的回顾之后，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二十世纪的中文翻译，或曰中华民国时期的『西学』，才是称得上有规模的『翻译运动』。也正是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数以千计的『汉译名著』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必读教材。1905 年，清朝废除了科举制，新式高等教育以新建『大学堂』的方式举行，而不是原来尝试的利用『书院』系统改造而成。新建的大学、中学，数理化、文史哲、政经法等等学科，都采用了翻译作品，甚至还有西文原版教材，于是，中国读书人的思想中又多了一种新的标杆，即在『四书五经』之外，还必须要参考一下来自欧美的『西方经典』，甚至到了『言必称希腊、罗马』的程度。

我们在这里说『民国西学』，它的规模超过明末、清末；它的影响遍及沿海、内地；它借助二十世纪的新式教育制度，渗透到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中，这些结论虽然都还需要论证，但从一般直觉来看，是可以成立的。中国二十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及『现代化』、『世俗化』、『理性化』，都与『民国西学』的翻译介绍直接有关。然而，『民国西学』到底是一个多大的规模？它是一

个怎样的体系？它们是以什么方式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认真研究，我们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还有，哪些著作得到了翻译，哪些译者的影响最大？『西学东渐』的代表，明末有徐光启，清末有严复，那『民国西学』的代表作在哪里？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并不能明确地回答，原因就在我们对民国翻译出版的西学著作并无一个全程的了解，民国翻译的那些哲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西学』著作，束之高阁，已经好多年。

举例来说，1935年，上海生活书店编辑《全国总书目》，『网罗全国新书店、学术机关、文化团体、图书馆、政府机关、研究学会以及个人私家之出版物约二万种』。就是用这二万种新版图书，生活书店编制了一套全新分类，分为：『总类、哲学、社会科学、宗教、自然科学、文艺、语文学、史地、技术知识』。一瞥之下，这个图书分类法比今天的『人大图书分类法』更仔细，因为翻译介绍的思潮、学说、学科、流派更庞大。尽管并没有统一的『社科规划』和『文化战略』，『民国西学』却在『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推动下得到了长足发展。查看《全国总书目》（上海，生活书店，1935），在『社会科学·社会科』学一般·社会主义』的子目录下，列有『社会主义概论、社会主义史、科学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议会派社会主义』等；在『社会科学·政治·政体政制』的子目录下，列有『政治制度概论、政治制度史、宪政、民主制、独裁制、联邦制、各种政制评述、各国政制、中国政制、现代政制、中国政制史』等，翻译、研究和出版，真的是与欧美接榫，与世界同步。1911年以后的38年的『民国西学』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而我们却长期忽视，不作接续。

编辑出版一套『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把中华民国在大陆38年期间翻译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著作重新刊印，对于我们估计、认识和研究『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接续当

时学统，无疑是有着重要的意义。1980年代初，上海、北京的学术界以朱维铮、庞朴先生为代表，编辑『中国文化史丛书』，一个宗旨便是要接续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重振旗鼓，『整理国故』，先是恢复，然后才谈得上去超越。遗憾的是，最近三十年的『西学』研究却似乎没有采取『接续』民国传统的方法来做，我们急急乎又引进了许多新理论，诸如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还有『老三论』、『新三论』、『后现代』、『后殖民』等等新理论，对『民国西学』弃之如敝屣，避之唯恐不及。

民国时期确实没有突出的翻译人物，我们是指像严复那样的学者，单靠『严译八种』的稿酬就能成为商务印书馆大股东，还受邀请担任多间大学的校长，几份报刊的主笔。但是，像王造时（1903-1971）先生那样在『西学』翻译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然后借此『西学』，主编报刊、杂志，在『反独裁』、『争民主』和『抗战救国』等舆论中取得重大影响的人物也不在少数。王造时的翻译作品有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摩瓦特的《近代欧洲外交史》、《现代欧洲外交史》、拉铁耐的《美国外交政策史》、拉斯基的《国家的理论与实际》、《民主政治在危机中》。1931年，王先生曾担任光华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政治系主任，后来创办了《主张与批评》（1932）、《自由言论》（1933），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2）。他在上海舆论界发表宪政、法治、理性的自由主义；他在大学课堂上讲授的则是英国费边社社会主义、工联主义和公有化理论（见王造时著《荒谬集·我们的根本主张》，1935，上海，自由言论社）。非常可惜的是，王造时先生这样复杂、混合而理想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实践，在最近三十年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中并无讨论，原因显然是与大家不读，读不到，没有再版其作品有关。

我们说，『民国西学』本来是一个相当完备的知识体系，在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断裂』之后，学者并没有好好地反省一下，哪些可以继承和发展，哪些应该批判和扬弃。民国时期好多重要的翻译著作，我

们都没有再去翻看，认真比较，仔细理解。『改革、开放』以后，又一次『西学东渐』，大家只是急着去寻找更加新颖的『西学』，用新的取代旧的，从尼采、弗洛伊德……到福柯、德里达……就如同东北谚语讽刺的那样：『熊瞎子掰苞谷，掰一个丢一个。』中国学者在『西学』武库中寻找更新式的装备，在层出不穷的『西学』面前特别害怕落伍。这种心态里有一个幻觉：更新的理论，意味着更确定的真理，因而也能更有效地在中国使用，或者借用，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这种实用主义的『西学观』，其实是一种懒惰、被动和浮躁的短视见解，不能积累起一个稍微深厚一点的现代文化。

讨论二十世纪的『西学』，一般是以五四『新青年』来代表，这其实相当偏颇。胡适、陈独秀等人固然在介绍和推广『西学』，倡导『启蒙』时居功至伟，但是『新文化运动』造成不断求新的风气，也使得这一派的『西学』浅尝辄止，比较肤浅，有些做法甚至不能代表『民国西学』。胡适先生回忆他们举办的《新青年》杂志，有一个宗旨是要『输入学理』，即翻译介绍欧洲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知识，他还大致理了一个系统，说『我们的《新青年》杂志，便曾经发行过一期「易卜生专号」，专门介绍这位挪威大戏剧家易卜生，在这期上我写了首篇专论叫《易卜生主义》。《新青年》也曾出过一期「马克思专号」。另一个《新教育月刊》也曾出过一期「杜威专号」。至于对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日耳曼意识形态、盎格鲁·萨克逊思想体系和法兰西哲学等等的输入，也就习以为常了。』（唐德刚编译：《胡适口述自传》，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年，第191页）。胡适晚年清理的这个翻译目录，就是那一代青年不断寻找『真理』的轨迹。三四十年间，他们从一般的人性论学说，到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从不列颠宪政学说，到法兰西暴力革命理论、德意志国家主义思想，再到英格兰自由主义主张，大致就是『输入学理』运动中的全部『西学』。

胡适一语道破地说：『这些新观念、新理论之输入，基本上为的是帮助解决我们今日所面临的实际

问题。」胡适并不认为这种『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的做法有什么不妥。相反，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学』的方法论，大多认为翻译为了『救国』，如同进口最新版本的克虏伯大炮能打胜仗，这就是『天经地义』。今天看来，这其实是一种庸俗意义的『实用主义』，是生吞活剥，不加消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简单思维，或曰：是『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从我们收集整理『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的情况来看，『民国西学』是一个比北大『启蒙西学』更加完整的知识体系。换句话说，我们认为『五四运动』及其启蒙大众的『西学』并不能够代表二十世纪中国西学翻译运动的全部面貌，在北大的『启蒙西学』之外，还有上海出版界翻译介绍的『民国西学』。或许我们应该把『启蒙西学』纳入『民国西学』体系，『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

我们认为：中国二十世纪的西学翻译运动，为汉语世界增加了巨量的知识内容，引进了不同的思维方式，激发了更大的想象空间，这种跨文化交流引起的触动作用才是最为重要的。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变得不古不今，不中不西，并非简单的外来『冲击』所致，而是由形形色色的不同因素综合而成。外来思想中包含的进步观点、立场、方案、主张、主义……具有普世主义的参考价值，但都要在理解、消化、吸收后才能成为汉语语境的一部分，才会有更好的发挥。在这一方面，明末徐光启有一个口号可以参考，那便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反过来说，『翻译』的目的，是为了中西文化之间的融会贯通，而非搬用；『会通』的目的，不是为了把新旧思想调和成良莠不分，而是一种创新——『超胜』出一种属于全人类的新文明。二十世纪的『民国西学』，是人类新文明的一个环节，值得我们捡起来，重头到底地细细阅读，好好思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邀我主编『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献弁言于此，是为序。

〔英〕伯利 (J.B.Bury.) 著 宋桂煌 譯

思 想 自 由 史

中華民國十六年九月初版

譯序

現今在先進的國家裏，思想自由已被視為當然的事，平常的事。但在歷史上，除希臘、羅馬時代理性活動完全不受阻遏外，其餘都有壓迫思想的勢力存在。學者的發表新思想或貢獻新事物，動受當局的逼害。今日西方人士所享受的宗教、言論、出版等自由實是經無數磨折和犧牲才能獲得的。茲譯英國伯利（J. B. Bury）氏所著思想自由史（A History of Freedom of Thought）即敘述這種理性與權威的爭鬪經過的。權威方面的主力軍為基督教；牠為人類創了殘殺的根據和方法，使西方人士度了千餘年的黑暗生活。「我們一回想到有那麼多的理性戰士喪命於不算毒心也是盲目的使用權威者的手裏，我們要怎樣震顫呀！」

思想自由史目次

第一章	思想自由與其阻力（緒言）	一
第二章	理性自由時代（希臘與羅馬時代）	一五
第三章	理性被禁錮時代（中古時代）	四一
第四章	解放的期望時代（文藝復興時代與宗教改革時代）	五九
第五章	宗教的寬容	七九
第六章	唯理論發生時代（十七世紀與十八世紀）	一〇九
第七章	唯理論進步時代（十九世紀）	一五一
第八章	思想自由之辯明	一九九

第一章 當代思想與其阻力（緒言）

我們常聽得人家說，思想是自由的。原來一個人無論思想什麼，只要想所肚裏秘而不宣，總沒人能禁止他的。限制他的心的活動者，只有他的經驗和他的想像力。但這種私自思想的天賦自由是無甚價值的。一個人既有所思，若不許他傳之他人，那末，他就要覺得不滿足，甚至感着痛苦，而對於他人也無價值可言了。並且思想既在心底上活躍，是極難隱藏的。一個人的思想一旦要懷疑支配他周圍的人的行為的觀念和習慣，或要反對他們所持的信仰，或要改善他們的生活方法，而他又堅信着他自己所推證的真理，那末，要教他於言語態度中不表露出他的與衆不同之處，那是不可能的事。有一種人寧就死而不願隱藏他的思想，在古代如蘇格拉底（Socrates），在現在也不乏其人，所以思想自由，從牠的任何價值的意義看來，是包含着言論自由的。

現在在最文明的國家中，對於言論自由總視為當然的事，很平常的事。我們已慣於這

種狀態，所以當牠是一種天賦的權利。但這種權利經過了許多的血戰，到最近才能獲得的。費了數百年之久，才能使那些最開化的人民信服發表個人意見和討論各種問題的自由是一件好的事，而不是一件壞的事。人類社會（有幾個顯著的例外）大都是反對思想自由的，換句話說，就是反對新的觀念，其原因也不難發見。

常人天生遲鈍，大都缺乏抵抗力。他們的精神界裏的信仰都是不加疑問而承受的，並且是堅執不疑的；凡是推翻現社會固有秩序的事，他們本能上都是仇視的。所謂不能與他們所持的信仰相一致的新觀念，就是說他們的心有改造的必要；可是這番手續又非易事，必得費許多腦力才行。社會上的大部分是這一種人，一切新觀念和懷疑各種固有信仰和制度的意見，在他們看來，都是罪惡的，他們的理由就是與他們不適合。

這種由於頭腦遲鈍而起的抵觸又因一種積極的恐懼情感而加甚。由保守的本能造成一種保守的教條：社會組織上如有什麼改變，就要危險到社會的各種基礎。一國的幸福專賴牠的能穩固不搖和一切習慣制度的能保守不變的那種信仰，到晚近才得革除的。無

論何地，這種信仰一經流行，各種新的意見就都被視為危險的、擾害的了，如有一個人對於一向承受的原則發生『為什麼』的不合時流的疑問，那末，他就要被視為一個有毒的人物了。

保守的本能和牠所造成的保守的主義又因迷信而勢力益大。若社會的組織——包括習慣和思想的全體——與宗教信仰有了密切的關係，且被視為在神的保護之下，那末，批評社會秩序就是犯着不敬神之罪了，而批評宗教信仰就更不啻對超自然的權力者直接挑戰了。

產生仇視新觀念的保守精神的種種心理動機又因社會上某幾有勢力的部分——例如一階級，一門閥，或一僧族——的積極反對而更加猖狂；這種有勢力的部分的利益是專賴固有秩序和固有秩序所根據的種種觀念的能夠維持不變的。

我們試設想有一種民族，他們相信日蝕是他們的神爲着某項於他們有益的事件而示的預兆，有一個聰明的人却發見了日蝕的真因。其餘的人見到這種發見很難與他們的

舊觀念相調和，所以只覺得討厭；又因這種發見推翻了他們所認為於社會最有利益的習慣，所以又是擾亂了他們；並且這種發見是違犯神意，所以又使得他們懼怕。那以解釋上天的預兆爲職權之一的僧侶，見了這種新學說要妨礙他們的權力，自然也非常懼怕，非常憤怒了。

在草昧時代，這種動機在社會上佔的勢力甚大，一定阻止了許多社會的進步，或使社會的進步遲緩了。自後在歷史上多少曾妨礙了知識和進步。在今日，即在最進步的社會中，這等動機，雖已失了勢力，不能阻礙進化，或禁止革命思想的發表，可是我們仍見他們在下蠢動。我們仍時常遇見一種人，他視新觀念爲擾害的東西或危險的東西。一班討厭社會主義的人，大都對於贊成牠或反對牠的理由都不加以考察，祇是老板板地厭惡，他們的理由祇是因爲這種思想要擾亂他們的精神界，並且對於他們所慣習的事物秩序含了激烈的批評。又有一班人見了改革現代不健全的婚姻制度的提議，絲毫不肯加以考慮，因爲這種觀念違犯與宗教禮式相連的許多成見就是他們唯一的理由。試看以上這兩種人在現社

會中還怎樣的多呀！他們是否正當，那是不一定，但總不能深責他們。他們所以如此者，也正因受着以上所說阻礙初民社會進步的那種動機的影響罷了。在現代自由的空氣中，四面的人日日追求新觀念，惟恐不得，尚有這種頭腦的人存在，由此我們可以推想到當古代公共意見爲這等人所支配的時候，人們的思想怎樣的被束縛，阻礙知識的勢力怎樣的大呀！不顧權威，不顧他人的成見而發表意見的自由，在現在雖已成了固定不移的原則，但我想在古代只有很少數寧死不屈的人才能根據理性以爭取這種自由。我們每認言論自由是人們與生俱來的不可侵犯的天賦權利，或即以此爲各種反對論的充足答辯。實則這種權利是怎樣才得建立的，不易見出。

若認人類有幾種所謂『天賦的權利』，那末，保持生命的權利，蕃殖種族的權利，一定是屬於這一類了。可是人類社會中有許多限制，使好些人不能享受這種權利。窮苦的人要取屬於他人的食品是被禁止的。亂交是有許多法律和習慣禁止的。現在大家公認社會的限制這些原始的權利是應該的，因爲若沒有這些限制，那末，社會的秩序就要紊亂了。我們